

第七届『诗经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詩經研究丛刊

中国诗经学会◎编

第十二辑



诗经研究丛刊

第十二辑

(第七届《诗经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)

中国诗经学会 编

學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诗经研究丛刊. 第12辑/中国诗经学会编. —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07. 9

ISBN 978 - 7 - 5077 - 2952 - 8

I. 诗… II. 中… III. 诗经—文学研究—丛刊 IV.
I 207. 222 - 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4011 号

责任编辑: 战葆红

出版发行: 学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

网 址: [www. book001. com](http://www.book001.com)

电子信箱: [xueyuanyg@sina. com](mailto:xueyuanyg@sina.com)

[xueyuan@public. bta. net. cn](mailto:xueyuan@public.bta.net.cn)

销售电话: 010 - 67674055、67675512、67678944

印 刷 厂: 北京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

开本尺寸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11. 375

字 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200 册

定 价: 35. 00 元

編 委 會

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主 編： 夏传才

編 委： 王长华 王洲明 向 熹 刘毓庆

赵沛霖 赵逵夫 赵敏俐 董治安

第七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

(代序)

女士们,先生们:

你们好!你们一路辛苦了!现在正是伏天,从世界各地,从祖国四面八方,中外学术界二百多位精英会集到这川北古城,来参加《诗经》学术会议,这说明了三点:一是《诗经》本身的价值,《诗经》是中华文化的元典,也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,是它吸引了学者们恒久的注意力;二是在座的学术界朋友们的学术研究热情,大家多年来锲而不舍地研究这部古老的典籍;三是我们学会为中外的《诗经》研究之繁荣和发展也做了一点推动工作,这是全体会员和全体理事共同努力的结果,在这里向各位致谢!

21世纪以来,《诗经》研究成果累累,据资料室初步不完全的统计,6年来共出版研究专著和普及读本约30种,各类论文近1000篇,其中我们的会员出版专著近20种,在学会年会论文集和第11辑会刊上共发表论文近500篇;另外,学会还出版了大型文献集成——《诗经要籍集成》,还有两项大型工程也已经开工。在商潮滚滚、纯学术研究面临出版难、发表难的状态下,《诗经》学术研究长盛不衰,而且产生这样多的成果,确实是可喜的局面。在研究质量上,基本上正如我们学会在成立时即提倡的:努力开展多元的、全方位的、多层面的、多文化和跨文化的研究,推动诗经学向深度和广度发展。这几年出现了一些很有深度的、有开拓性的著作和专论。例如,对《诗经》出土文献的研究,对长期被忽视的《雅》

《颂》的研究,对《诗经》学史上一些被忽略的作者及其著作的研究,关于中国文学对《诗经》的接受的研究,关于《诗经》文化人类学研究,对《诗经》语言语法规则、成语的研究以及字词新释等,都有很好的成绩。现在,我们希望这种发展态势继续下去,再上一层楼。

要发展就要总结,要前进就要创新。学术研究的本质就是创新,没有创新,就没有学术,我们应该向低水平的重复说“不”!

中国现在发展很快,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,就是我们的学术研究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。在目前国学热的大潮下,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。国内也出现了重读《论语》《诗经》等国学经典的热潮。社会需要供各个层次读者阅读的《诗经》选本和全本。要编著体现时代新水平的读本,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。首先,我们要以文本的再深入研究为前提,利用最新的学术成果,在题解、注释、今译上有所进步。除了文本学,还需要普及诗经学的基本知识。近几年诗经学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有突破,一些大学课本上关于诗经学基本知识的章节,或有很多不足之处,或理论陈旧。20世纪50~60年代的读本显然要更新换代,这又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。重视对文本研究和基本问题研究新成果的总结,并且予以普及,是全社会对我们提出的要求。

开发《诗经》地方文化资源,是我们面临的第二项现实任务。各个地方都有地方文化特色,有民俗文化传统,这是我们建设精神文明工作中必须充分重视的。这几年中,我们做了两件事。一件是在2002年,在河北省河间市与地方政府合作举办了毛诗发祥地考察和研讨会议,中外代表共同在会议上制定了重修毛公墓、重建毛公书院、建立《诗经》碑林、建立《诗经》博物馆共四项规划,现这项工作正在逐步实施之中,部分已经落实。第二件事是今年3月与地方政府合作,组织了《诗经》发祥地国际考察团到八百里秦

川的中部——周代丰、镐旧京遗址和东部洽川进行考察,重点是东部的洽川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。当时提出的考察宗旨是“开发地方文化资源,发展旅游经济”。在洽川研讨会上,我提出个人的认识:八百里秦川是《诗经》的发祥地,洽川是其中璀璨的明珠,洽川遍布《诗经》文化遗迹,是《诗经》文化之乡,是中国爱情诗之源。这次考察活动,有中外记者 60 多人随团采访,在世界上引起广泛关注。香港《大公报》在第一版整版进行报道,《文汇报》也有图文报道;美国《世界日报》第一版边栏有报道,《马来西亚日报》也有整版报道;另外卫星电视和 200 多家网站都有报道。这次活动提高了洽川国家风景名胜区的知名度,说明我们为开发《诗经》地方文化资源,发展地方旅游经济,出了一点力。这样的事利国利民,同时也是普及《诗经》的工作,使《诗经》成为广大人民的精神财富。我说的那三句话,第一句话“八百里秦川是《诗经》发祥地”,第二句话“洽川是诗经文化之乡”,这两句都没有问题,第三句“中国爱情诗之源”,文献依据不足,欧阳修、朱熹先后注《关雎》是咏文王和太姒之事。文献材料既不能证实,也无依据推翻,只能作为一说,此说我则参照了民俗文化。其实,“源”也不会只此一个,开发地方文化资源,参照地方民俗文化,未尝不可。海外媒体据这话大肆宣传,倒使我尴尬了。在开发地方文化资源的工作中,如何利用民俗文化,是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
《诗经》学是当代一门兴盛的研究领域,我们要继续发展多元化、全方位、多层面的研究格局,提倡创新,提倡面向社会。关于创新,我们更需要一代新人。曾经参加历届年会的朋友们会发现,我们这次会上出现了许多新面孔,与会的一多半是中青年学者。中国学术界的一代新人,已经成长起来,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。

大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。本会于 1990 年开始筹建,1993 年

正式成立。成立本会的发起人,一部分已经逝世,也有一部分年老体衰,离开学术战线。本会早期的基本会员大部分已经退休,或者因为身体不好,或者因为无处提供学术经费,不能来参加学会活动。我们对逝世者表示深深的悼念;对不能参加本会活动的老朋友致以诚挚的问候;对年轻的会员,表示热烈的欢迎。我曾经说过:我们必须加大力度吸收年轻人入会,为他们创造发展的平台,不然的话,不要多久,年老的都退了,这学会也不存在了,而且《诗经》学的发展也断层了。在我们学会里,希望年老的再带年轻的走一程。他们都是我们的学生,这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啊。

继承《诗经》的风雅比兴传统,借鉴它优良的艺术经验,发展现代诗歌艺术,也是本会的宗旨之一,所以历届年会都组织诗词晚会,兼带笔会。因日程紧凑,我们安排在最后一晚,请大家准备参加。西华师范大学承办本届年会,作了充分的准备,还排练了一台精彩的文艺活动,有歌舞和“变脸”等川剧绝活表演。他们十分辛苦,让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!

谢谢大家。

夏传才

2006年8月4日

目 录

第七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	夏传才(1)
《周礼》“六诗”与周代的乐教传统	杨朝明(1)
郑玄《毛诗》笺注中反映的阴阳谶纬思想	
及其成因初探	李世萍(9)
执中行权与孟子说《诗》	王以宪(21)
从阐释学的角度谈竹书《性情论》与《孔子诗论》的	
关系	张玖青(34)
《诗》行天下:从《盐铁论》大辩论的引《诗》	
批儒说起	[美国]林中明(50)
孔颖达《诗》学观论略	王长华 易卫华(79)
日本古代建筑物中以《诗经》诗句	
命名的名胜古迹	[日本]村山吉广(100)
苏辙《诗集传》之经世思想探析	(中国台湾)吴叔桦(131)
《诗经》治川作品辨证	(中国香港)黄坤尧(144)
《诗经》养生思想述论	(中国台湾)谢绣治(155)
《诗》与孔门教学	陈 霞(182)
中国人伦关系的构建	
——《诗经》中禽鸟意象的探讨 ...	(中国香港)蔡若莲(192)
从“诗道性情”析论王夫之对“兴观群怨”说的	
再诠释	(中国台湾)刘原池(208)
论《诗经》的忧患意识	吴美卿(229)

源自《诗经》的成语的形态结构	何慎怡(237)
《诗经》郑、卫二风的成语研究	(中国台湾)陈玫惠(249)
《诗经》形容词的配价研究	赫琳(264)
《诗经》的介词“自”	罗庆云(275)
《诗经》中设疑修辞艺术的运用	钱明锵(284)
“条桑”正释	萧东海(300)
《诗·齐风·甫田》征人之忧心	[美国]吴少达(306)
《诗·采蘋》“有齐季女”新解	曹建国(309)
两年来中国大陆《诗经》研究论文综述	刘生良 谭曜岐(320)

《周礼》“六诗”与周代的乐教传统

杨朝明

关于《诗经》的分类,人人都知《诗序》以“六义”,即风、雅、颂、赋、比、兴来论述《诗》之文本,按照孔颖达的说法,它们有体、用之别,即所谓“用彼三事,成此三事,故同称为义,非别有篇卷也”。可是,周代又有“六诗”之说,《周礼·春官宗伯》说大师“教六诗:曰风、曰赋、曰比、曰兴、曰雅、曰颂”,不难看出,《周礼》“六诗”与《诗序》“六义”不同,前者明显属于六种并举之体。在《诗经》研究中,学者每每以乐言诗,从而以风、雅、颂三分今本《诗经》。古代诗、乐一体,《诗三百》原也是周代的乐章,可以诵、弦、歌、舞,那么,《周礼》“六诗”也应当与乐有关,更何况《周礼·春官宗伯》还有大司乐以乐德、乐语、乐舞“教国子”的记载。由此,《周礼》“六诗”应当蕴含了许多的学术信息,通过探讨,可以了解今本《诗经》成书以前的诗、乐关系,了解周代的乐教传统。

人们注意到《周礼》“六诗”的价值,与对《周礼》其书的认识有重要的关系。众所周知,《周礼》所叙述的官制,其中所言职官体系,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,显得十分整齐,十分细密。人们在想,远在四千年前,周人难道能够有如此系统的政治管理制度?在疑古思潮泛滥时期,人们往往用后世文献与《周礼》比对,显然,《周礼》中的不少概念都可以在后世典籍中找到。另外,《周礼》中所述职官又不可能都得到“可靠”文献(包括金文材料)的证实,于是,尽管

前人对周公作《周礼》(亦称《周官》)言之凿凿,却依然有人怀疑,到了后来,相信者越来越少,《周礼》成书很晚几乎成为学人共识。

所庆幸的是,最近几十年来,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《周礼》,人们研究该书的成书,研究它的史料价值。学者们认识到,《周礼》成书不会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时间很晚,其中所述制度不会是空穴来风,一定都有历史的依据。我们认为,从学界不少的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利用金文材料的研究^[1]来看,恐怕《周礼》成于周初,乃是“周公致太平之迹”的传统说法更经得起考验。既然《周礼》是研究周代历史的重要津梁,那么,研究周史,如果不重视《周礼》,就会失去很多宝贵的材料。

实际上,人们研究西周的历史问题,往往难以脱离《周礼》。在诸子百家中,儒家最重视社会教化,探讨儒学问题,就离不开对周代教化传统的研究,离不开对西周时期官学教育的了解,否则,就难以说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有那样的学术思想特征。我们不断看到有学者从文字训释的角度,从字源学的角度说“儒”解“儒”,这当然可以作为一种探索途径,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,“语学的”、“史学的”研究方法,还不足以说明“儒家”作为一种思想的来源。^[2]要准确而全面地把握儒学,还应当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孔子、儒家思想的起源,而这样的研究往往必须追溯到《周礼》的相关记载。^[3]

儒家重视乐教,自然也必须从《周礼》的记载中寻找渊源。《周礼·春官宗伯·大司乐》:

“大司乐掌成均之法,以治建国之学政,而合国之子弟焉。凡有道者、有德者,使教焉。死则以为乐祖,祭于瞽宗。以乐德教国子:中、和、祗、庸、孝、友。以乐语教国子:兴、道、讽、诵、言、语。以乐舞教国子:舞《云门》、《大

卷》、《大咸》、《大磬》、《大夏》、《大濩》、《大武》。以六律、六同、五声、八音、六舞，大合乐以致鬼神祇，以和邦国，以谐万民，以安宾客，以说远人，以作动物。”

大司乐掌管学政，以有道、有德者教导国子，从而祭祀天地鬼神，和谐邦国万民，整合社会人心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周礼》称“以乐语教国子：兴、道、讽、诵、言、语”，它正是理解《周礼》“六诗”的关键。《周礼·春官宗伯·大师》：“大师掌六律六同，以合阴阳之声……教六诗：曰风、曰赋、曰比、曰兴、曰雅、曰颂。以六德为之本，以六律为之音。”在“乐语”与“六诗”之间，存在着一种联系。对此，今之学者朱渊清先生已经指出两者既有共同之处，也有差异。他说：“差别在于大师掌管的是‘六律六同’，以乐工为教；大司乐掌管的是‘成均之法’，以‘合国之子弟’为教。故‘六诗’偏重于‘乐’，基本按风（徒歌）、赋（吟诵）、比（和唱）、兴（合唱）、雅（配器乐）、颂（配打击乐和舞蹈）这种音乐性递增的次序排列；‘乐语’六类则偏重于‘语’，于是按兴（合唱）、道（和唱）、讽（徒歌）、诵（朗诵）、言（韵语，‘歌永言’之‘言’）、语（白语）这种音乐性递减的次序排列。”朱先生还引《贾子新书·传职》之言：“号呼歌谣声音不中律，燕乐雅颂逆乐序，凡此，其属诏工之任也”。认为这说明古乐语、六诗是依乐序设教的。^{〔4〕}

对于《周礼》“六诗”，学者们已经有所留意，并认识到它与周代乐教传统的密切关系。^{〔5〕}《周礼》明言“大司乐”的职责是“建国之学政”，其“教国子”，除了“乐语”，还有“乐德”、“乐舞”。需要留意的是，三者之中，《周礼·春官宗伯·大司乐》首言“乐德”，这应该是周代乐教中最为重要的，“乐语”、“乐舞”则是“乐德”教育的辅助。“乐语”、“乐舞”与“乐德”的关系，应该是一种形式与内容之

间的关系。

按照《周礼》的说法,所谓“乐德”,即指中、和、祗、庸、孝、友,这些“德行”,为后世儒家所大力倡导;这些概念,常常出现在儒家典籍之中。可见,它们在儒家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。从这些概念中,也能够察见其与后世儒家之间的密切关联。例如,孔子曾说:“广博易良,乐教也。”^[6]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,也就是使人变得豁达、平易而又善良,这甚至可以作为《周礼》所言“乐德”的注脚。《周礼》又明确地说,“大师”教六诗,乃“以六德为本”;《周礼》又说瞽蒙“掌《九德》、《六诗》之歌”,同样将“诗”与“德”并言。周代乐教,恐怕最根本的目的即在于此。

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索,周代的乐教传统是否也渊源有自呢?很显然,就像周礼乃是从前代之礼中“损益”而来那样,《周礼》记载的主要内容也都会有历史的源头,特别是有关“乐教”的思想更是这样。

从礼乐歌舞的特征看,礼乐歌舞的起源、发展应当与人类文明的演进同步,因此,人们认识音乐的教化功能也会很早。据记载,夏朝以前,已经出现了典乐之官,而且那时的人们对诗歌声律的社会教化功能也有了深刻的认识。《尚书·舜典》载帝舜命夔典乐教胄子:“帝曰:‘夔!命汝典乐,教胄子:直而温,宽而栗,刚而无虐,简而无傲。诗言志,歌永言,声依永,律和声。八音克谐,无相夺伦,神人以和。’夔曰:‘於!予击石拊石,百兽率舞。’”

《礼记·乐记》说:“王者功成作乐,治定制礼。其功大者其乐备,其治辩者其礼具。”古代圣王得天下,往往制礼作乐。所以,在周代,掌乐之官能够掌握和演奏历代之乐,《周礼·春官宗伯·大司乐》所说到的《云门》、《大卷》、《大咸》、《大磬》、《大夏》、《大濩》、《大武》都是如此。古代圣王功成作乐,当然也基于他们对乐

舞的理解与认识。这可以从后人的有关论说中得到印证。如《国语·周语下》记伶州鸠论钟律曰：“夫政象乐，乐从和，和从平。声以和乐，律以平声。金石以动之，丝竹以行之，诗以道之，歌以咏之，匏以宣之，瓦以赞之，革木以节之，物得其常曰乐极，极之所集曰声，声应相保曰和，细大不逾曰平……夫有和平之声，则有蕃殖之财。于是乎道之以中德，咏之以中音，德音不愆，以合神人，神是以宁，民是以听。若夫匮财用，罢民力，以逞淫心，听之不和，比之不度，无，而离民怒神，非臣之所闻也”。

诗言志，歌咏言，诗乐声律有益于教。基于此，周人才十分重视乐教；又因为诗、乐相连，周代“大师”才以“六诗”为教。有学者认为：“《周礼》‘六诗’乃周代‘乐教’之纲领，习乐之教程。”^{〔7〕}周代的乐教原来如此，难怪后人那样看重乐教，难怪《礼记·乐记》说：“乐者，通伦理者也”，又说：“审乐以知政”。

周代的贵族教育有诗有乐，周代的社会教化当然也同样重视诗教与乐教。但是，在周代，由于诗、乐不分，还看不出“诗教”与“乐教”的分离，文献中也没有这样明确的概念出现，二者仿佛是二位一体的。然而，孔子之时，二者已经有所区别，如孔子说：“入其国，其教可知也：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诗教也……广博易良，乐教也……故诗之失，愚……乐之失，奢……温柔敦厚而不愚，则深于诗者矣……广博易良而不奢，则深于乐者矣。”^{〔8〕}

“诗教”与“乐教”的分离与春秋社会的变动有关。相比于春秋时期，西周时期可能更重视乐教，随着周王室的衰微，社会上“礼崩乐坏”，乐人四散。如《论语·微子》说：“大师挚适齐，亚饭干适楚，三饭缭适蔡，四饭缺适秦，鼓方叔入于河，播鼗武入于汉，少师阳、击磬襄入于海”。这样，周代的乐教传统也面临断裂的危机，在社会教化方面，虽然诗乐仍然难以完全区分，但有时候，“诗”已经可

以独立于“乐”而被应用。

在“礼崩乐坏”的背景下,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开始收拾遗缺,整理诗、乐,宣传乐教。与古乐衰亡的同时,儒家的诗教主张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,尤其是孔子删诗,整理成《诗三百》;又正乐,使“雅、颂各得其所”。以后,在儒家的倡导下,“诗教”与“乐教”都得到重视。后来虽然也有人出来“非乐”,但更有人重视音乐,重视乐教。因为声乐毕竟有自身的特点,正如《荀子·乐论》所说:“夫声乐之入人也深,其化人也速,故先王谨为之文。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,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。民和齐则兵劲城固,敌国不敢婴也。如是,则百姓莫不安其处,乐其乡,以至足其上矣。然后名声于是白,光辉于是大,四海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师,是王者之始也”。儒家提倡“王道”,自然重视先王所制定的礼乐。

孔子以前,诗、乐的教育一直受到重视。春秋时期,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是人们共同学习的科目,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七年》中有“说《诗》、《书》而敦《礼》、《乐》”就证明了这一点。《礼记·王制》云:“乐正崇四术,立四教,顺先王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以造士,春秋教以《礼》、《乐》,冬夏教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。”说的也是春秋时期的普遍情形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为“先王”之书,为士人所必须修习,因而受到孔子的重视。

孔子曾经整理“六经”。所谓“整理”,当然不是凭空制作,而是有现成的材料或者底本。例如《诗经》,现在看到的乃是孔子删订后的本子,即《论语》等书中所说的《诗三百》。孔子以前,“诗”当然存在,而且也不会与孔子整理后的本子差别很大,孔子删订的目的乃求其用,非求其异。也就是说,孔子希望作为读本《诗》应当更加实用,更加有益于教化,他不会去专门用心追求与已有《诗》之教本差异。

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所记“季札观乐”有曰：“吴公子札来聘……请观于周乐。使工为之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……为之歌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卫》……为之歌《王》……为之歌《郑》……为之歌《齐》……为之歌《豳》……为之歌《秦》……为之歌《魏》……为之歌《唐》……为之歌《陈》……为之歌《小雅》……为之歌《大雅》……为之歌《颂》……曰：‘……观止矣！若有他乐，吾不敢请已！’”吴公子季札至鲁观乐时，孔子年仅八岁。从这段记载看出，孔子以前的《诗》与孔子删订后的《诗》，在基本面貌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异。

诗、乐的历史是漫长的，到春秋时期，它至少已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历程。仅仅西周春秋时期，也有数百年的演变过程，而诗、乐的应用及其分工也不断地进行着。从前面的分析看，“六诗”本来是作为歌乐的不同表述方式，后来，口头传唱的歌乐被著为文本的《诗》。在此之后，“六诗”的原始功能逐渐丧失，其职能发生了改变。这样，“六诗”之名也名存而实亡，诗、乐结合的乐教，发展成诗、乐相对独立的“诗教”和“乐教”。

综括全文，不难看出，周代的诗、乐教化都有历史的渊源，也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。由于它们本身所具有的特征，使得诗与乐相连，古代诗教、乐教也关系密切。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，周代应当是诗教、乐教并重。只是春秋以降，礼乐崩坏，周代的传统乐教面临空前的危机，随着周王室的衰微，古乐的消亡，出现了诗、乐相分的趋势。逐渐地，诗教功能凸显。而相比之下，周代的传统乐教却愈加逊色。在“礼崩乐坏”的背景下，孔子开始重视传统的诗教、乐教。不过，在孔子删诗、正乐之后，虽然儒家仍然重视乐教，毕竟时代变化，乐人流失，而与之同时，诸子著作引诗，多出《诗三百》中，孔子所删订的《诗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，于是，诗教重于乐教